

王作良 著

小疵不足以损大器，短疵不足以累长才。日月挟虫鸟之瑕，不妨丽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浊，不害凌山之流。



葛洪
Ge Hong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葛洪

王作良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SK16N14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洪 / 王作良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7313-2

I. ①葛… II. ①王… III. ①葛洪(284—386) — 传记 IV. ①B23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2646号

葛 洪 GE HONG

王作良 著

责任编辑	王奉文 彭 燕
特邀编辑	石慧敏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313-2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3879 传真：(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引言 葛洪及其学术成就 / 001

第1章 葛洪的生平和时代 / 004

动荡不安的时代 / 004

玄谈的兴盛 / 008

葛洪的家世 / 015

葛洪的生平 / 021

第2章 《外篇》的主要内容及成就 / 034

《外篇》内容及成就概述 / 034

抨击不良士风时俗 / 038

“德行”“文章”并重的士人观 / 045

知人善用的人才观 / 051

对鲍敬言“无君论”的批判 / 062

第3章 道教名著——《抱朴子·内篇》 / 068

《内篇》的内容及成就简述 / 068

葛洪道教理论体系中的“玄”“道”观 / 074

道、儒并重的修炼观 / 077

推尊“上士”的隐逸观 / 080

“君子藏器以有待”的出处观 / 083

新型的圣人观 / 093

德政与用刑并重的治理观 / 097

长生久视与仙道理论 / 100

养气与内修之术 / 110

第4章 葛洪医学及其他方面的成就 / 117

葛洪的医学成就 / 117

葛洪其他方面的成就 / 123

第5章 葛洪的有关遗迹与传说 / 129

余论 兼收并蓄的思想体系 / 141

附录

年谱 / 147

主要著作 / 150

引言 葛洪及其学术成就

“中国炼丹术系统化者”“那时代（指两晋之交）最伟大的炼丹术士”“中国空前伟大的炼丹术著者”“他正如是一位伟大的炼丹术士般，也是一位伟大的医师”，这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对一个中国化学者的高度评价，这个学者的名字叫葛洪，在中国的炼丹术思想和早期的化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中称葛洪为东晋最大的“道教徒”。葛洪炼丹的有关主张主要保存在他的代表作《抱朴子》中，他是道教金丹道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在《中国科技与文明》中，李约瑟博士在论及中国的天文史、气象史和矿物学时也经常性地提到葛洪。另外，李约瑟在他的另一部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也有专门一节论述“葛洪和科学思想”，称誉葛洪为“公元4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家”，并由此认为“整个医学化学源于中国”。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葛洪在中国道教史、科技史上的地位。英国的 *Nature*（1927年）及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1934年、1936年）都曾经对葛洪及其《抱朴子》作过深入探讨。葛洪是世界公认的化学鼻祖、中国十大医王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十分大的道教文化巨匠。

葛洪的思想，特别是道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抱朴子》中，在中国道教思想系统化的进程中，葛洪功不可没。“《抱朴子》一书可谓道教教理之纲领，而葛洪其人，推阐仙道，播传甚力，建立有系统之道教学理基础，亦可称为道教之功臣也。”（蓝秀隆《抱朴子研究》）《抱朴子》一书，内容涉及面颇广，除了道教有关学说外，对各家学说都有吸收。由于身处乱世，葛洪不光表现出对道教信仰的推崇，“援儒入道”“外儒内道”的处世观，使得葛洪在现实中主张“儒道双修”“出处两得”。卿希泰《从葛洪论儒道关系看神仙道教理论的特点和本质》中即指出，葛洪既要达到通过修炼而长生成仙的目的，又不废弃佐时治国的理想，因而在推崇道家的同时，又提倡德政与用刑并重。长生成仙的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内篇》中，而《外篇》更侧重于对儒家思想的阐释。不过，诚如王明在《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中所言：“葛洪的思想比较复杂，前期绝非纯儒，后期也并非纯道。在他前一阶段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思想里，渗透着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后一阶段的神仙道教思想里，却也没有容纳老庄所有的理论。”“葛洪的思想变迁大体就是从入世而遁世，从儒家而皈依神仙道教。”

其实，除了在儒道思想的贡献，葛洪一生勤于著述，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凡的成就，在文学、军事学、思想史等诸多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东晋葛洪外，南宋孝宗时期亦有名叫葛洪的学者。南宋葛洪（1152~1237），初名伯虎，字容父，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葛府人，后居城内葛宅园，曾从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学习。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曾任东阳尉，嘉定间为枢密院兼国史院编修，又奏请严饬将帅呈报军用器材装备以杜绝弊端，被嘉纳。历任工部尚书兼侍读，国子监酒，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绍定元年（1228）十二月任

参知政事，封东阳郡公，卒赠太师，封信国公，谥“端献”。著有《奏议杂著文》二十四卷、《蟠室老人文集》、《涉史随笔》等。

第 1 章

葛洪的生平和时代

动荡不安的时代

葛洪（283~343）生活的两晋之交，是两晋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南朝梁沈约在《宋书·武帝本纪》中说：“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西晋建国后，只保持了短暂的安定局面，而长期的动荡不安随着晋惠帝的继位而至。太熙元年（290）三月，晋武帝司马炎离世，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司马衷登极，史称晋惠帝。惠帝当政后，先是外戚杨骏擅权，后又遭遇贾后乱政，由司马氏开创的帝业，在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中迅速走向衰败。

晋武帝死后，杨骏独揽大权，他掌管朝政，是凭裙带关系获取的。杨骏也深知自己素无威望，便用加官晋爵来收买人心。不料很多人虽然加官晋爵，却更加鄙视杨骏。杨骏的作为，引起了很多人的极大不满，特别是惠帝皇后贾南风，她怒火冲天，决心要把大权从杨骏手里夺过来。贾南风是开国权臣贾充之女，容貌丑陋，性格冷酷，善于玩弄权术。贾南风还是

太子妃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吃醋杀过太子的几个妾侍。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妾侍怀了孕，亲手拿了一支戟掷到那个妾侍的肚子上，胎儿当即流产而死。晋武帝得知后，几次要把这个狠毒的儿媳废掉，因一些大臣的反对而作罢。她利用晋室部分皇族的不满情绪，联合朝廷中的反杨势力，积极活动，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的同谋伪称杨骏谋反，晋惠帝下诏讨伐杨骏，杨骏被乱枪刺死。第二年，贾后又将晋武帝的皇后，也就是杨骏的女儿杨芷幽禁起来，杨芷最终冻饿而死。

杨骏垮台后，大臣们拥戴汝南王司马亮和著名书法家卫瓘主持朝政。司马亮虽然懦弱无能，这次回朝却很大方，为笼络人心，他也学着杨骏的样子滥加封赏。对拥护他的人，都以讨伐杨骏有功的名义加官晋爵，仅封侯的督将（武官）就有一千多人。楚王司马玮是晋惠帝的异母兄弟，因为襄助贾后有功，也被重重封赏。掌权的司马亮和卫瓘都认为他骄横跋扈，不易控制，便想把楚王和几个别的宗室遣回封地去，借此剥夺楚王的兵权。司马玮得知后，与贾南风勾结，消灭了司马亮与卫瓘。卫瓘是西晋的开国功臣，他的无端被杀，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贾后利用朝臣的这种心理，借机又杀了司马玮。从此，贾后大权独揽，形成了悍妇控制白痴皇帝，恣意擅权的局面。

晋惠帝即位后，因贾后无子，便立谢官人所生的司马遹为太子。贾后对此十分不满，费尽心机想废掉太子。司马遹长大后，十分贪玩，不愿读书学习，对此，贾后不加管教，还经常派人引诱太子去干坏事，希望太子越变越坏，以便找到理由废掉他。永康元年（300）十一月，贾南风假称生子，原指望晋惠帝因此而废掉太子，但却梦想成空。贾后便制造冤案，太子终于被废，被囚禁了起来。此后不久，贾后联合司马伦等人，命人用石杵将太子活活打死。

贾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臣的极端不满。朝臣们选择了

晋宗室司马伦来对付狠毒阴险的贾后。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因贾后有恩于他，成为贾后的亲信。朝臣们选中司马伦，是因其为人生性贪鄙，有野心，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杀死太子的时候，司马伦采用了一箭双雕的计划，想通过这种途径借机也除掉贾后。太子死后，司马伦串联了自己的兄弟梁王司马彤、晋文帝的孙子司马冏等人铲除了贾后集团，杀死了贾后的许多党羽，逼晋惠帝将贾后废为庶人，紧接着毒死了贾后。

司马伦除掉贾后以后，重权在握，还不满足，封自己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相国为群臣之首，早在曹魏的时候，司马昭、司马炎都曾担任过相国，他们也因此而颠覆了曹魏政权，因此，西晋开国以后，就不再设立这个官职。相国一职，在人们心目中，已不是为人臣者所能担任的职务。赵王自封为相国，明摆着是要当皇帝了。除此之外，赵王又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王侯，还自设卫兵万人，将太子东宫作为他的相国府。此后，又立临海王司马臧为皇太孙，自己兼任太孙太傅。尽管这样，司马伦也知道笼络人心的重要，他也仿效杨骏、司马亮，大肆给人加官晋爵，封侯者多达几千人。司马伦所倚重的孙秀，本是狡黠贪淫之辈，臭名昭著，掌握着朝廷的实权。他们狼狈为奸，倒行逆施，许多人都看不惯。

时任骠骑将军的淮南王司马允，为人比较正直，处事也很果断，禁卫军的将士对他都很敬畏信服。面对赵王阴谋篡位的所作所为，司马允蓄养力量，打算除掉司马伦。后因伏胤矫诏，司马允惨遭失败，赵王反败为胜，展开了血腥的屠杀，杀害淮南王部属和亲友达数千人。

镇压了司马允以后，赵王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先由孙秀出面，逼迫晋惠帝加赵王九锡。加封九锡是赤裸裸的逼宫。九锡为传说中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自王莽开始，成为夺权的象征。此后，司马伦又逼迫晋惠帝下了禅位的诏书，

并强行窃取了玉玺。永宁元年（301）正月初九，赵王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司马伦梦想着，只要当上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不想称帝才一个多月，齐王司马冏就首先发兵讨伐。接着，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响应。几十万人马杀奔洛阳。司马伦抵抗不住，被迫写下退位诏书，晋惠帝复位。恶贯满盈的司马伦，后被朝廷赐死。

司马伦死后，参与讨伐司马伦的皇族们心怀鬼胎，终于使宫廷政变转变为皇族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除了上文提到的司马冏等人外，还有长沙王司马义、东海王司马越参与混战，史称“八王之乱”。战乱由京城波及地方，愈演愈烈。“八王之乱”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灾难，造成几十万人被杀，上百万人流亡，北方一些繁华的地区和城市，被摧毁殆尽。直到光熙元年（306），大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这场绵延十六年的战乱才告结束。“八王之乱”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此后中国社会进入南北长期对峙、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此时的江南与北方相比，要相对安宁一些，但并不太平。晋惠帝太安二年（303），长江、沔水之间爆发了以张昌为首的流民起义，起义军一度攻下扬州、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等地，严重威胁到江东世家大族的利益。同年十二月，以周玘、顾秘、贺循、甘卓、华谭等人为首的江东世族起兵平乱。年轻的葛洪，也奉命参加了这次行动。两年后，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地方官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很快就攻下了吴越之地。陈敏欲借助江东士族之力，建立新的割据政权，但以顾荣为主的江东士人因他出身寒微，拒绝拥戴他做江东之主。以顾荣为首的世族又一次起兵响应西晋朝廷的讨伐行动，永嘉元年（307）再定江南。同年，后来被称为晋元帝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今江苏南京）。

司马睿为西晋远支皇族，在江南又缺乏威望，开始的时候，江东人士依附归顺的很少，后来，司马睿接受名士王导的建议，礼贤下士，安抚新、旧士人，又提倡节俭，为政简约，得到了顾荣、周玘为首的江东世族的认可，江东世家大族遂纷纷归附司马睿。司马睿即位之前镇守建邺的十年中，曾先后爆发了广陵一带的钱璜之乱、荆湘地区（今湖南、湖北一带）的以杜弢为首的巴蜀流民起义，这些都为江东人士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平叛机会。这样就改变了自从东吴灭亡以后，江东士人不被朝廷重视的局面，葛洪也曾因参与平定陈敏的战役，建立军功而受爵关内侯。但这种改变是极为有限的，司马睿集团中，掌握实权的还是北来的王导、王敦、刁协等人，而贺循、纪瞻等江东士人只有虚位，并没有实际权力。

建武元年（317），晋元帝建立东晋，改建邺为建康。永昌元年（322），权臣王敦自武昌举兵，攻下建康，刁协、戴渊等惨遭杀害，不少朝臣为了躲避血光之灾，辞官归隐。成帝咸和二年（327），苏峻、祖约联合，以讨伐庾亮为名，又一次攻占建康，杀戮无辜，直至咸和四年，陶侃、温峤联军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此后至葛洪离世的一段时间内，江左才渐渐安定下来。

葛洪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血雨腥风的战乱中，两晋名士张华、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郭璞、嵇含、嵇绍等相继惨遭杀害，江南世家大族周氏、沈氏也遭遇族灭的不幸命运，所有这一切，都不免对葛洪的人生选择和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葛洪代表作《抱朴子·内外篇》中的许多观念，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玄谈的兴盛

两晋时期，学界盛行清谈。根据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

“清谈”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清谈即所谓“玄谈”，唐翼明在《从世说看魏晋清谈之内容》中将其定义为：“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为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辩论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活动。”广义上的清谈，肇始于汉末建安时代的清议，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称其为“雅谈”，因汉末名士以清浊之分来评论正邪善恶，又被称为“正论”。其风气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是以人物品评、人物理论为主要内容，包含抽象玄理在内的名士崇尚谈论的一种社会风气。

清议的兴起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宦官专权与士风的败坏是其直接原因。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控制着官员的选拔。此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掌权宦官的爱憎行事，严重地堵塞了正直之士的上进之路。另一方面，儒者徒有虚名的现象已非常普遍。范曄在《后汉书·儒林传上》中指出，当时的学界“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一些世家大族身居高位，却惧于宦官的威势，对黑暗的政治噤若寒蝉。《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引《抱朴子·外篇·审举》所言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黑暗现实的真实反映。

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就是所谓的“清议”。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如“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所谓“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

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郭泰在当时及其后很长时间里都享有盛名，人们推崇他的博通坟典，善于识人，弟子数千。另一方面，他也因精于品题人物而备受推崇。葛洪同时代的嵇含就认为，郭泰尽管没有接受司徒黄琼、赵典的举荐，但因其学问无所不涉猎，又能识别人才，为人明智，名声超过了前代的任何人。葛洪在《外篇·正郭》中描述郭泰当时的影响说：郭泰声誉隆盛，使得远方的秦地、胡地的人都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街巷中塞满了大官乘坐的车子，路上人马络绎不绝，家中高朋满座，贵客盈门。如此，友朋之间，彼此推尊，朋党交游讲究虚文末节，渐成风习，充斥着整个社会。这种风气，在南北朝时仍有延续，史书中多用清谈来概括门阀势力借助清议掌握铨选大权，从而达到扩张士族势力目的的现象，如南朝沈约《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中说：“史臣曰：‘世重清谈，士推素论。’”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也有记载，如卷十三中《沈约传》云：“乘时藉势，颇累清谈。”卷二十一《王暕传》中曰：“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

清议经过三国曹魏时期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人的继承发展，至三国两晋之交，演变为清谈，主要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等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在两晋，清谈更是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股崇尚老庄之学的思潮，当时人又称之为“清言”，或“玄远之谈”“虚谈”“玄论”“谈论”等。参与论辩的士人，时人称誉他们为“名士”“名胜”“明通”“名理”等。

何晏、王弼，开创魏晋玄谈之风。何晏为人放诞不羁，但从其《论语集解》中反映的思想，尚不失儒者矩矱；王弼的《易注》，对后世儒学发展亦有较大影响，与《论语集解》同列《十三经注疏》。更为重要的是，在探讨宇宙万物之起源时，王

弼摆脱了两汉四百年经学倡导天地主宰天运的学说，而绍述老庄本意，代两汉宇宙论学说为《周易》的宇宙论。两汉人以阴阳学说阐释孔子之说，王弼、何晏则以老庄思想来说孔。至嵇康、阮籍，崇尚质朴率真。因司马氏一方面专权，一方面又高倡名教作为遮羞布，为了对抗这种风气，嵇、阮转向老庄，表面放弃礼法，放浪人间，还大胆宣称“礼法岂为吾辈设”。其实他们对抗的，是所谓的伪礼。到了西晋时期，官高位显的王衍、乐广，是当时士人公认的清谈领袖。玄学的兴起，是东汉末年儒学的日渐没落与汉代道家自然主义日益兴起的一种自然演变的结果。

清谈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从而引起争辩。争辩形式或为驳难，或为讨论。辩论的双方一般分为主客两方，人数不限，有时两三人，或者更多。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若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或“谈机”。在清谈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对某一命题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对手则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其他的参与者也可以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称为“谈助”。讨论结束时，主客双方或看法一致，握手言和，或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也会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元康以后的放达派人物，因现实的黑暗与政治的残酷，不愿正视现实，即使清谈也徒求狂放的形式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思想并不具有原创性，正像葛兆光著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的概括，阮籍病死之后的清谈“常常是玄言的游戏或演练，玄理本身已经成了次要的东西”，清谈中，人们更为欣赏的是名士们“手执麈尾”的潇洒风度，而不是清谈命题本身了。衣冠华美、容貌昳丽，其他如舆盖、言行、容止等，无不成为叹赏的对象，如晋戴逵《竹林七贤论》：“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